

人物春秋

“一第何为，徒使老亲增悼痛”
——英年早逝的吴肇嘉

□周思璋

2019年9月25日《江海晚报·文化周刊·记忆》中有一篇《旧文新刊·记人七则》(作者瞿镜人)。其中第一则是谈的如皋吴肇嘉,说:“吴肇嘉,字仲懿,如皋籍,居南通兴仁镇,江阴南菁书院高才生,清光绪中进士,未及殿试,暴卒于北京寓所,年仅二十余……”

十多年前,如皋有人从上海图书馆抄到北京国子监清代全国进士题名碑中如皋籍进士姓名,回来与如皋档案馆中《同案录》核对,发现《同案录》中载有一位光绪五年己卯科秀才,光绪十四年戊子科举人,光绪十五年己丑科进士吴肇嘉(原注:登张建功榜)。未见于国子监的进士题名碑,不知何故?

如皋《同案录》是近代如城袁蓬仙老先生手录,前有他儿子袁采之先生的序言:“清代继明,奄有中夏,一切庶政率由旧章,故考试制仍以八股文取士,惟中选者院榜案题名外,他无考证。洎乎光绪末年,兴学育才之议下,而隋唐从来科举制度遂以告终。家君感全邑士子致力于学而幸获一衿者,颇有考据,于是手录有清一代科岁试之登第者成册,曰《同案录》。上自顺治乙酉(1645),下迄光绪甲辰(1904),二百六十年间先后订一百七十案,并系以岁时、诗文题,至于典试官之姓名、资历,靡不翔实。又按邑丞所辖乡会试之中试者,暨五贡三成名者,弁诸册前。虽未臻完善,然地方文献有足征矣!余以斯册迭遭兵燹而幸全无遗,世乃有宠荣其父祖与余同好者,或能裨补遗漏,以资刊行,更所愿望。岁在乙酉(1945)桂月,后学袁亮工(采之)识于自首居。”(袁蓬仙,名寿莱,系袁采之之父。)

明清两朝规定:凡举人参加礼部考试考中者应称为“贡士”,须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赐出身者

方可称为“进士”。《同案录》将吴肇嘉列于“进士”,未加说明,稍嫌疏忽。

姜光斗先生所著《范伯子》中说,吴大桥夫人“受姬哥哥吴肇嘉的影响,多才多艺,通书法,兼能吟诗”,又说吴夫人比其夫范伯子年长四岁,于光绪九年(1883)病逝,年三十四岁。如按此推算,吴肇嘉歿于光绪十五年,比大桥夫人多过了六年,应当是四十岁以上了。瞿文中说他“年仅二十余。”从范伯子和姚永概二人的挽吴肇嘉联看来,还是以“年仅二十余”为适当。可能因为吴家先后住在如皋和通州两地,故通如两地人士对吴肇嘉的生平不甚清楚。

历来如皋人经商的很少,何况还把店开到通州兴仁镇。倒有不少外地人来如皋经商,多年以后子孙入了如皋籍。据《同案录》记载,清代光绪以后如皋籍的秀才中有邓建勋(字子猷)光绪二十年,祖籍江苏句容,在如皋城里开嫁妆店;江朝宗(字伯觐)光绪十四年,祖籍安徽徽州,是咸丰年间因逃避太平军战争而迁来如城的,在西门外开油饼陆陈行;吴肇璜(字西垣)光绪二十三年,祖籍江苏镇江,住在如城冒家巷,后来曾任县立乙种艺徒学校校长;祝光祖(字觐宸)光绪二十八年,祖籍浙江,在如城开油坊;还有俞铭盘(字新三)、俞铭德(字达三)兄弟二人分别是光绪二十七年和三十三年秀才,祖籍安徽徽州,在如皋丰利均经商。

大约吴肇嘉祖上也是来如皋经商或逃难的外地人,已入了如皋籍,后来又迁到通州兴仁镇。从前男婚女嫁要求门当户对,通州范家虽然是书香门第,但家道清寒,范伯子多次应试未第;吴家是小康的商贾人家,吴夫人比丈夫年长四岁,可见这门亲是互相迁就的。范伯子虽然屡试未第,但他的“桐城派”古文和诗很好,所以得到张裕创、吴汝纶、李鸿章、陈三立等名家的赏识。姚家是“桐城派”嫡传后裔,故而姚家兄妹对范先生极为钦佩。

轶闻掌故

冒怀辛岁末寄旧照

□彭伟

冒怀辛(1924—2009),生于北京,祖籍如皋,学者冒广生生长孙,自幼接受庭训,毕业于东吴大学政治系,又师从侯外庐先生,攻读中国思想史,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常年从事文化史研究工作。

出于乡缘,笔者热衷收藏冒怀辛先生的书信。其中一通信封上写有“上海瑞金二路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剑雄先生启”。函中是几张旧照复印件,并附有箴语,抄录如下:剑雄:

去秋去皖。今夏去星洲。复印(照片)聊供一览。新加坡的会称为“明清之际文化变迁讨论会”。遇到一些熟人。顾再告,即祝年禧。

毛景华、怀辛 上
98.12.25

上款“剑雄”即李剑雄,1942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后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后更名上海古籍出版社)从事编审工作。他与冒怀辛熟稔,缘起工作关系。1992年,冒怀辛整理的《冒鹤亭词曲论文集》即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外,早在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方以智全集》也与冒先生关系密切。此书主编者为侯外庐先生,标

点者就是冒怀辛。书中长篇前言《方以智的生平与学术贡献》的作者署名侯外庐,实为冒先生。因此,冒先生无疑是研究方以智生平思想的权威专家。信中“去秋去皖”与此有关,有照片复印件作证:1997年11月—13日,安庆师范学院、安庆市政府、安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举办全国首届“方以智与明清文化学术研讨会”。全国及日本学者40余人应邀参会。11日,与会人员合影留念。冒怀辛作为首席专家,与师范学院书记坐于前排正中,安庆市长、毛景华、师范学院院长等人坐于他俩身边。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过《方以智全集》,于是冒怀辛将此次大会召开的信息,告知李剑雄,理所当然。

“星洲”是新加坡的旧名。1998年,冒怀辛、毛景华前往新加坡,出席“明清之际文化变迁讨论会”。他给李剑雄寄去两张相关照片复印件。一张是他独坐会场上的小影。另一张是与会人员合影。冒怀辛个子高,“鹤立鸡群”,位于前排正中右边,位于他左侧的正是清华大学何兆武教授。“遇到一些熟人”,大概就包括何教授等人。

当时出国不易,又逢元旦、春节将至,于是冒怀辛才去信李剑雄,通告近况,又顺祝年禧。



苏社成员在博物苑中馆合影,1920年

南通老照片

海陵旧话

瘟疫在如东的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虽然记载不多或“语焉不详”,但多少也有点痕迹。

如东,原为如皋东乡。如皋在西汉初年为吴王刘濞的封地,汉高祖十二年时属海陵县。从那时算来,已有2214年。在这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如东(皋)人与病魔瘟疫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息,虽然屡屡付出惨重的代价,但“人间正道是沧桑”,如东的人口越来越多,如东人的人均寿命越来越长,“如意东方”的家园也越来越近。面对着“春风杨柳万千条”,如东人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没有忘记大自然的怪癖和历史烙下的伤痛。

有史可查,明清两代,前者从兴到亡276年,后者275年,各发生过七次瘟疫。明代是:正德十三年(1518)、嘉靖三十三年(1554)、三十八年(1559)、万历十六年(1588)、崇祯十一年(1638)、十三年(1640)、十四年(1641)。清代是乾隆朝5次,即乾隆四年(1739)、十五年(1750)、二十一年(1756)、二十四年(1759)、五十一年(1786)。另加道光元年(1821)、光绪二十八年(1902)各一次。具体疫情无文字可查,但大多数与天气干旱有关。当时,政府重在观望而无力救治,更谈不上发动民众群防群控。少数地方贤达或寺庙出于善意施医施药施材(棺材),但能力有限,大势难回,只

靠老百姓求神拜佛或以巫术驱邪送鬼祈求平安。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虽然政治体系起了根本的变化,但瘟疫的肆虐并未收敛。民国九年(1920)秋,霍乱流行,来势汹汹,锐不可当,区区掘港死亡300余人,真是骇人听闻。笔者幼年听长辈们说,有位本家爷爷,时值盛年,身强力壮,因亲戚暴亡去悼念,回来时夜色已深,他索性不睡觉,搬了张凳子坐下剥麻,一直剥到天亮,也没感到疲倦,可时近中午,觉得身上有点不对劲,不一会天旋地转,未等日落便气绝身亡。如此情况者,左邻右舍中,随手可数。过了五年(1925),鼠疫又起,7月前后,掘港死亡80余人。民国二十年(1931)马丰耕地区霍乱流行,仅一千多人的耕茶,死者过百。又过五年,即1936年秋,疟疾大流行,史称“死亡甚众,虹元乡病死甚多”,“耕茶死20余人”。两年后(1938)的初秋时节,暑源刚消,掘港又流行起一种怪病——登革热,此病主要由蚊子传播,潜伏期5—9天,出现发热——皮疹——出血——淋巴结肿大——剧烈头痛、恶心、呕吐、意识障碍、颈强直乃至死亡。这个病凶猛异常,“历时月余,十室九病,少有幸免”。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这些急性瘟疫,更如猛虎下山,常让市镇上的商家措手不及。据说,常有顾

客进店买货,付过钱还没来得及拿货出门便仆地而死。人命关天,商家害怕,赶紧修整店堂,建起一种“半路子门”——下半截砖墙,上半截为可拆卸的木板。顾客站在“半路子门”外购买商品,万一倒下,也倒在大街之上,而不是倒在店老板的家里。这种建筑形式,笔者年幼时亦曾见过,只是没想到这是当年恐怖的遗存。

1940年新四军东进,抗日民主政府关心民瘼,整个社会环境都起了很大的变化。1946年夏天,瘟疫又起,霍乱流行。父亲告诉我,那年我6岁,弟弟3岁,我们兄弟俩都上吐下泻,染上了霍乱病。他用一副鲜篮(挑鱼货的扁平敞口篾篮),一头挑着一个小孩上街看病。返回时,走到东观音堂(离掘港东街头约4里)突然腹如鼓响,洩泻不止。他心似刀绞,仰天长叹:“天灭我陈也!”

好在时局已经改观,掘港已经新辟了医院、诊所,出现了季少三、陈朗清、陈道权、季汉源、蔡国梁等一批中西名医,就连乡间也时有悬壶济世的郎中来往,疾病得到了及时治疗,田里活儿又有拌工队与乡邻们帮助,患者又治疗又休养,很快就康复起来。不仅个人家庭免遭一劫,整个社会也战胜病魔,重获生机。我父欣逢盛世,虽劳苦而身健,后来寿至九五,无疾而终。

革命烽火

南线坚持斗争期间的“墩头会议”

□程太和

1947年上半年,是苏中地区南线开展敌后坚持斗争最艰苦的时期。3月6日,敌人“会剿”靖中、靖西,靖中地区为敌控制,靖西仅剩8个乡阵地。3月8日,城黄路南游击营遭敌4个营合击。3月17日,泰兴县团3个连及4个区队遭敌五路合击,19日分两批北撤至海安,靖西地区全部为敌占据。3月24日,敌“会剿”如西地区,3月28日,靖江、泰兴县团又遭敌102旅合击。在敌人的“追剿”围击下,一分区南线阵地大部分丧失,所能控制的基点仅占南线总面积的二十分之一。

为总结南线反“清剿”斗争的经

验教训,4月2日,华中一地委和一分区在海安北乡墩头庄召开南线4县(即靖江、如皋、泰兴、泰县4县)及海安县委书记和县团领导干部联席会议。会上,地委书记钟民作总结报告。会议总的精神是为了挽救南线危机,继续顽强坚持南线阵地。会议就如何对付敌人“集中兵力,分期分批,逐步推进,各个击破”的战术,进行了认真讨论,对反“清剿”斗争中一些指导原则、提出的口号,从斗争的实际出发,反复研究了各种不同意见。会议指出,今后坚持南线的方针不是“攻”和“退”,而是“拖”,以等待时机。要以现实的力量,发扬依靠南线300万人民的

传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敌人周旋,坚持公开武装斗争旗帜。为实施这一方针,会议做出部署:迅速整顿组织,加强战斗力量;统一思想,恢复斗志,顽强坚持;打击土顽,发动群众斗争;加强隐蔽斗争,大力开展反两面派工作。这次会议,统一了坚持敌后斗争的思想,进一步明确了坚持的方针,重新组织了力量,鼓舞了斗志,对当时的坚持斗争具有重大意义。

墩头会议后,地委书记钟民即率分区特务连、如皋县团一个连、靖江县团两个连,在敌行动之前,率先主动向边沿区出击,摧毁土顽组织,扫除部分障碍。